六岭书林

◆印象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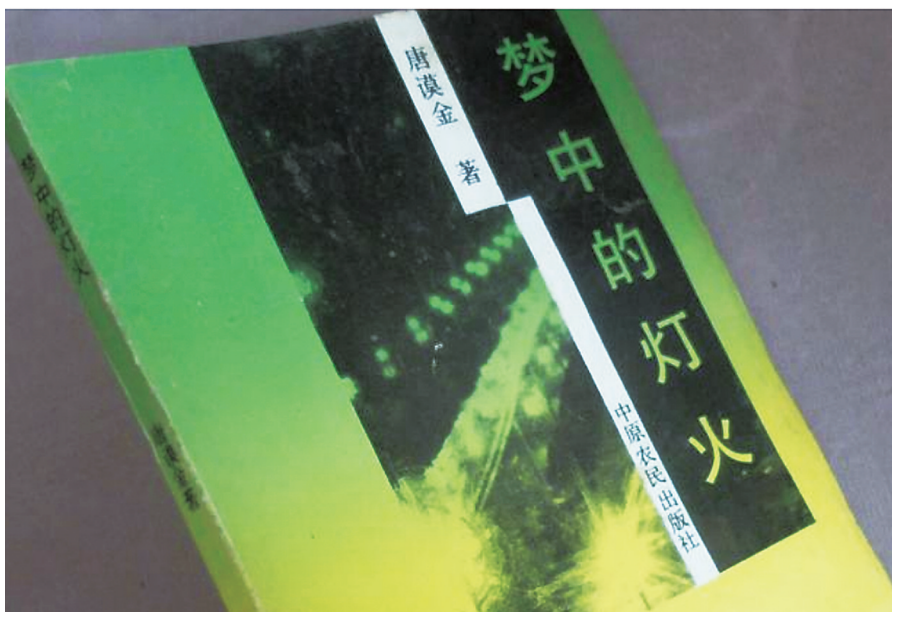
我的文学引路人

——怀念唐谟金先生

林日新

在武冈作协的微信群里,突然看到了恩师唐谟金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怦然一震。

于是,我从书架上拿起先生的散文集《梦中的灯火》,用手轻轻地抚摸。翻阅到其中的那篇《我的夹竹桃》,心里似海浪翻滚,眼前一片模糊。这篇《我的夹竹桃》是我与先生在1991年一起创作的。那一年,先生来南桥乡搞社教。由于全县要举行一次文艺汇演,春上的一天,乡文教专干老刘带着恩师来团结学校选演员。老刘让我唱一首《一剪梅》后,先生便决定让我担任他编剧的小戏剧《送伞》的男主角。



那时,我刚学写作,因为听刘专干介绍唐谟金先生是县文化局副局长,省内知名的作家,便把散文《我的夹竹桃》让先生指导。先生首先夸赞了我的文字功底深,语句优美等优点,然后指出中心不够明确,重点不够突出,最后他便删去一些多余的段落或句子,并在文末点题,这一下就把文章提高了好几个档次。我很高兴,当即把文章誊写一遍,并在作者的位置先署上他的名字。

先生推辞道:“别署我的名,这样不好的。”但在我再三请求后,先生才同意把他列为第二作者。一个月后,《我的夹竹桃》在《邵阳日报》发表了,编辑可能是发现这篇文章太具有“唐谟金散文”风采了,便把先生列为第一作者。先生看到后,再三向我表示遗憾和过意不去。先生这种提携后辈的拳拳之心,让我非常感动。从此,我视先生为我文学的“掌灯人”,一旦有文章写出,我就专程赶到先生家里请教。一次,在他并不宽敞的书房里,我看到了先生的“座右铭”:少年“穷”,人生辉煌的基点!我这才得知他也出身于贫寒的家庭,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儿子,靠勤学好问跳出了农门,靠勤奋创作取得了常人难有的成就。

我的小说《青石湾》开笔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最初写成了《抗婚》《小小毛货郎》《六爷爷》《无悔的岁月》等几个短篇小说。先生看了后就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后来,先生还与我一起对这几篇小说进行了艰难的重组、修改、删减、润色,最好改写成两万多字的《山乡毛货郎》,于2001年发表在《武冈文学》,2008年2月又发表在《传奇故事》上。这是我的小说第一次荣登国家级期刊,对我的鼓舞无疑是相当大的。

2017年我出版了一本散文随笔集《教育笔谈》,专程送书到先生家中。先生拿着书,看了一下封面和目录,然后特别仔细地看了版权页和封底上的条纹码,说:“这是一本货真价实的散文集,我一定好好品读。”当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是啊,人生还有什么比获得“偶像”的肯定更高兴的事呢?2018年春,我参加武冈市文联组织的“云山采风”活动,居然遇到了先生。于是,我就把自己想在半自传体小说需借用《山乡毛货郎》中的部分情节,征求先生的意见。他当即表示:“借用吧,那故事本来就是你的人生经历。”先生的一句话打消了我心中的顾虑。这年9月,长篇小说《青石湾》出版了,我又专程送到他家里。谁知“铁将军把门”,我打了三次电话也没打通,最终无缘与先生见面。后来,我只得托黄三畅老师把书转给先生了。

这几年,我多次参加武冈市作协的活动,可一次也没遇到过先生。听老一辈的文友说,先生近年来深居简出,很少参加户外活动,不写作、不上网……似乎过着与世隔绝的“居士生活”。对此,我很理解和佩服,因为先生一生为人质朴,待人诚恳,勤俭节约,淡泊名利,确有“五柳先生”之遗风。

先生在他刚过八十岁大寿之时溘然长逝,这让作为学生的我一下难以接受,而且我还是在他过世一个多月后才知道,这确是学生的失职和不敬啊!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邵阳文库》介评

《陈早春的文学世界》(下)

陈静

陈早春,作为一名从编辑成长起来的社领导,在其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主持编辑出版了众多的中外古今名著。但在众多图书中最值得一叙的,除其亲自参与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之外,还有《鲁迅全集》。

受中央的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鲁迅全集》编辑室”,他是编辑室的成员之一,是《鲁迅全集》第4卷、第13卷的责任编辑,并负责11卷、12卷、13卷全部书信的定稿。正当编辑工作紧张进行之时,陈早春的父亲去世。他为了不让在紧要关头的编辑工作受影响,忍住悲痛没有回家奔丧。在编辑《鲁迅全集》的过程中,他力求实事求是,对文中疑难注释,查资料找旁证,逐条订正,常常工作到凌晨。

他在具体负责《鲁迅全集》第4卷的编辑过程中,发现了攻击鲁迅的杜荃的名字下没有注释。杜荃是谁?许多读者都曾发出过这样的疑问。如果这次注释工作中,仍像1958年那样不加注明,工作显然要轻松得多,但他感到这是不完善的,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难道真的就查不出杜荃是谁吗?他决心查个水落石出。经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旁征博引,反复推敲,终于考证出了杜荃就是郭沫若。

陈早春在编辑全集的初稿上写明了杜荃就是郭沫若,但被定稿小组划掉了。第二稿时他仍然注明杜荃就是郭沫若,又被划掉了。第三稿、第四稿、第五稿他还坚持己见,结果都被划掉。在这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坚持要对历史负责。于是,他写了4000字的报告上书党中央,最后在负责《鲁迅全集》审定的胡乔木同志拍板下,终于在第4卷中加上了这条注释,解决了几十年的疑案。在他的建议下,《郭沫若全集》中也收录了郭沫若以杜荃为笔名写的两篇文章。陈早春的这条考证,不仅证据确凿,思维缜密,推理紧凑,逻辑性强,且具有散文的美韵。在一所著名高等学府的考古系,老师还把这篇文章复印发给学生,让大家学习如何进行推理考证。

后来,陈早春又参加了2005年版《鲁迅全集》编辑工作,是编委会成员之一。他两度参与修订《鲁迅全集》,这成了他人生中的一大亮点。

另外,陈早春作为湖南人,自有湖南人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在担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积极参政议政,除极力建议出版等方面的改革外,还在1993年参加全国政协八届第一次会议上,提案建议安排副总理管农业。此后,在1997年2月参加全国政协八届第五次会议时,与张惠卿、傅璇琮、沈鹏等委员联合提案对湖北咸宁市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资料加强开发及保护。

就此,如果有问陈早春为20世纪的中国及中国文学提供了什么,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在出版、鲁迅研究、冯雪峰研究、散文创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等几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当代被誉为最崇高的“文学殿堂”和“文学摇篮”,其中自有他的一份贡献。

(陈静,隆回县作家协会主席)

◆读者感悟

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

——记“淤泥之子”草树

邓旭初

虎年来临之际,诗人草树的第四部诗集《游泥之子》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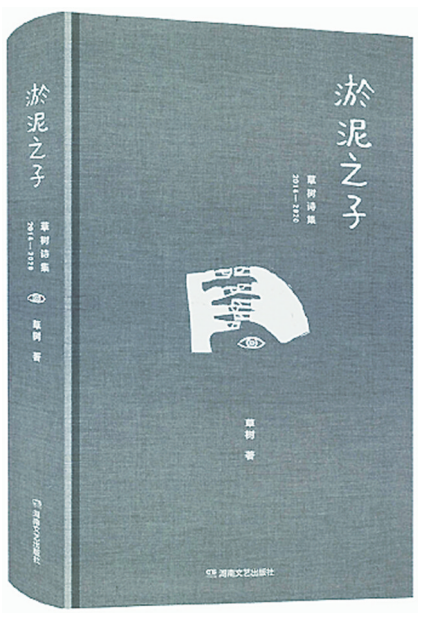
草树本名唐举梁,20世纪60年代出生于邵东廉桥镇一个名叫勺子塘的小山村,那一片文化和经济双重贫瘠的土地。据诗人自己介绍,很小的时候,他的爷爷在冬天经常会围炉讲一些历史故事,润物无声地激发了他的想象力。1981年,他考入湘潭大学化工系。虽然走进了理工科的课堂,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幼年就开始萌生的对文学的挚爱,随即他加入了湘潭大学的“旋梯诗社”。

大学毕业后,草树被分配到株洲一家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闲暇之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文学经典的阅读上——后来他离开研究所,他说最遗憾的就是几大箱文学经典片纸不存。1993年,他下海经商,先后办过涂料厂、塑料厂,投身房地产业。白天跑工地,晚上爬格子——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这几乎成了他的生活常态。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最先和当地的诗人和作家打成一片。2004年,当他要离开贵州黔东南的时候,黔东南电视台为他制作了一个专题片《儒商唐举梁》,记录了他在凯里多年的文学生活和诗意人生。

2000年以后,草树的诗歌写作进入了一个量的“堆积期”。这个时候,也是他事业的上升期,繁忙的事务没有捆住一颗挚爱诗歌的心。那个时候,夜晚应酬归来,偶尔在电脑旁写出一首诗,就相当于一次“换气”。十年磨一剑,草树的创作最终获得了文学界的广泛认可。2012年,他的作品获第20届柔刚诗歌奖提名奖,2013年他的长诗《精馏塔》获得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

2010年,草树从广西归来,定居长沙,彻底脱离商业圈,潜心诗歌写作和研究,在《诗刊》《今天》《十月》《汉诗》等重要刊物发表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和诗歌评论文章,并受聘于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授诗歌写作。在某种意义上,诗对于草树来说,不单是一种精神生活,甚至是命运:他不断跨界,从化工工程师到国企副厂长,从私营业主到房地产开发商,兜了一大圈,他还是回到了诗歌,回到文学,仿佛所有生命的轨迹只是为诗歌写作做着生命经验和文学知识的准备。如今他的生活除了写作和讲课外,就是出席诗会、座谈会,论坛等。

光2021年一年,他先后在《诗刊》《广州文艺》《诗潮》《草堂》等刊物发表诗歌百余首。他曾在《汉诗》专栏发表诗论文章《语调之摆》《修辞立其诚》,在《今天》发表专论《长明灯的悲伤摇曳:论杨键》《平静的沸点:论毛焰的诗与画》《木讷是极静的表现:论吕德安》,在《长江丛刊》上发表《旗手之旗的卷缩与舒展:论韩东》等,还写有论多多、于坚、昌耀、张枣、陈先发、莫非等诗人的专论,这些评论文字已结集成《文明守夜人》一书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当年10月,他还参加了《诗刊》在四川巴中举行的第十二届青春回眸诗会。



草树是邵东这片土地上养育的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优秀诗人,从他的许多作品中都不难发现家乡的影子——与其说是“影子”,不如说是一个地方的原初存在和精神气脉。

作为一个当代诗人,正因为他曾经进入这个时代的核心场域,他的诗也充满历史。草树自称是“淤泥之子”,他当然也是大地之子,更是文明之子。

(邓旭初,双清区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书与人

父亲的书

王征安

1962年母亲病逝后,八岁的我和六岁的弟弟便跟着父亲住进了运输公司的宿舍里,其实就是公司办公楼里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房里一张旧床,一张脱了油漆的书桌,一对放衣服的箱笼,便是父亲的全部家当。父亲是一位搬运工人,从小就在玉带桥码头上挑脚担谋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进入运输公司,并担任公司党支部副书记。父亲没上过一天学堂,后来到总工会举办的夜校学习,才认识一些字,勉强摘了文盲的帽子。父亲虽然识字不多,但喜欢看书。他的书桌上总摆着一本书,大红封面,金字标题,那是本厚厚的《毛泽东选集》。每当晚上我和弟弟爬上床睡觉后,父亲便坐在书桌前,戴着老花眼镜认真地看起书来。有时还拿着钢笔在书上写写划划,一副很专注的样子。看书累了,他卷根“喇叭筒”吸在嘴角,浓重的旱烟辛辣味满屋子弥散,父亲咳嗽不已,也常常把我和弟弟从睡梦中呛醒过来。

父亲没读过诸如《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文学名著,也没读过什么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他唯一爱读的就是那本《毛泽东选集》,这也许和当时的形势有关吧。父亲曾经被评为运输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远赴省城参加过表彰大会。当时年幼的我不知道父亲的心思,只晓得父亲活得很累很苦。他一边工作一边带着我和弟弟,既当爹又当娘,实在不容易。但山一般的重负没有压垮父亲,他坦然地面对艰辛困苦,还坚持不懈地看书。

父亲对他的书看得很重,他经常告诫我和弟弟不要乱动他的书。有一天中午,我从河里洗澡上来,弟弟神秘地跑到我面前,从小口袋里掏出一些饼干塞到我手里。我问他哪来的钱买饼干,他眨了眨眼睛说卖了一本书给废品店。我大吃一惊,知道他把父亲心爱的那本书给卖掉了。我问他卖了多少钱,他说卖了两毛钱全买了饼干。那本书是父亲的最爱,不见了书他肯定会大发雷霆,弟弟少不了挨揍。果然,当天黑我和弟弟胆怯地回到房间时,父亲正在房里焦躁地走动。见到我和弟弟回来,就铁青着脸问谁拿走了他的书。我想替弟弟挡难,便回答说肚子太饿了,屋里又找不到吃的东西,就把书卖给废品店换饼干吃了。谁知弟弟倔强地站出来承认是他把书卖掉的。父亲当时火冒三丈,气恼地扬起巴掌想揍弟弟,可手扬在半空中呆住一直没揍下来。片刻后,他一把将我和弟弟搂在怀里,眼眶里溢满了泪水。

第二天上午,父亲带着弟弟去东门口废品店赎回了那本《毛泽东选集》,赎费是三角钱。从此,父亲把书看得更紧了,他用旧报纸将书封面包好,每次看后便放进抽屉里锁起来,生怕又出什么意外。后来,父亲调到建筑公司工作,他一直带着这本书。再后来,父亲退休了,他把这本读了几十年之久页面已发黄的书送给了我。我至今仍收藏在自己的书架上。

如今父亲已离开我们多年了,每当我在书架前翻阅这本书时,便仿佛看见父亲从书里走出来,那些关于父亲和这本书的往事便会在我的脑海中一一浮现。

(王征安,武冈市作协会员)